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2-0139-06

王世杰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薛 毅

[摘要] 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尤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王世杰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人物。这一时期,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主席团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中央设计局负责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重要职务,是蒋介石特别倚重的智囊,是蒋重要的高级幕僚和顾问。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王世杰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经常对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建言献策,他多次提出政治解决的方案,寻求缓和国共冲突的办法。他参加了国共两党之间举行的主要谈判,并在谈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涉时往往以王世杰为主要对手,并把他作为谨慎合作的对象,其他民主党派也常常把王世杰视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向其提出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王世杰;抗日战争;国共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7年2月国民党通知中共驻南京等地的代表全部撤返延安,史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时期,王世杰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人物。在此期间,他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担任多种重要职务,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他经历并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诸多重大事件,尤其在国共会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开展对于王世杰的研究,对于深入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同时,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增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和沟通对话,有利于改善海峡两岸关系,有利于改善国共两党关系。本文拟研究王世杰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系及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以期推动国共关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

一、王世杰在西安谈判中崭露头角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曾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辛亥革命爆发后,投笔从戎。民国初年,他以辛亥革命功勋的身份被官方派遣到欧洲留学,获得伦敦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和系主任、代理教务长,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教育厅长等职。1929年担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从1933年起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主席团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重要职务。以上诸多职务,以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主席团主席、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责任最为重大。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王世杰是蒋介石政治决策的主要参与者。正因为王世杰有着丰富的阅历和身兼数职,使得国民党方面把他作为与共产党方面谈判的理想人选。

早在抗战初期王世杰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期间,他就开始了与中共代表的接触和商谈。由于工

作的需要,王世杰经常与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接触,特别是和董必武、秦邦宪、陈绍禹等驻会委员。

1942年7月3日,王世杰与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会谈的内容包括国共合作、军政统一、国民党释放叶挺和廖承志、国民党向延安派联络参谋等事。除了释放叶挺之事王世杰无权做主之外,其它事宜都得到了解决或有所进展。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解散共产国际组织。国民党内一些人员乘机提出解散中共的意见。国民党的报刊也为此大造舆论,国共关系一度紧张。这年9月18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鉴于当时国共关系处于紧张的状况,共产党方面留在重庆的参政员董必武不打算出席本次会议,故迟迟未去报到。王世杰闻讯后亲自前往董必武住处劝说,并说明国民党方面没有在这次会议上反共的打算,使得董必武如期参加了会议。事后董必武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9月16日《中央日报》有一篇声讨中共的社论出现,最后并说要我们答复。17日上午7时,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雪艇来,以个人资格劝我去报到出席。我答以:我留在重庆,并没有打算不出席,但因国民党骂得这样凶,参政会上如要作反共言论和决议,这必引起我的抗辩,我想不出席,让这些反共代表去骂个痛快算了,何必去寻这样毫无益处的麻烦呢?王雪艇说,他知道政府方面没有要在参政会来反共,蒋主席作主,蒋不会在会上讲什么。”^[1](第86页)10月初,王世杰、邵力子先后与中共代表董必武会谈,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刺激对方。王世杰还一再表明:“政府对边区无用兵之意,主张政治解决国共争端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主张政治解决的情况下,也明确表示愿意重开两党谈判,解决两党争端,维护两党的继续合作。”^[2](第1425页)

到了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这一年,德国战败已成定局,日本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的抗战进入末期。国共谈判的内容从此明显发生变化。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方面的谈判代表是王世杰和张治中,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林伯渠。

1944年4月16日,王世杰从蒋介石处得到了由何应钦拟订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这个《草案》是根据蒋介石“政治放宽,军事从严”的指导思想制定的。王世杰在4月21日的日记中对此的记载是:“蒋先生指定予与张文伯与行将来渝之中共代表林祖涵,磋商中共问题之解决。”^[3](第193页)日记中谈到的张文伯即张治中。从这一天王世杰的日记可以看出,这一次国共谈判原计划在重庆举行。但到了4月28日,蒋介石临时决定王世杰、张治中先赴西安与林祖涵进行初步商谈,意在先摸一下中共谈判的底牌。4月30日晚,蒋介石向王世杰、张治中面授机宜,“勉彼等对林谈话不可过于相信,并不可过于放宽”,表明了蒋对这次国共谈判的基本立场。

1944年5月2日,王世杰和张治中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从重庆飞抵西安,准备同中共代表林伯渠举行会谈。5月3日,王世杰和张治中前往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礼节性拜访了林祖涵,双方约定翌日开始正式商谈。

会谈从5月4日开始。据王世杰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前约林祖涵与予及张文伯开始商谈。……予等询中共对于解决目前僵局之方案,彼谓彼并未带有新方案,彼等之意见已由周恩来、林彪于去岁提出,迄未经蒋先生批复,彼愿政府对该方案予以答复。予等当嘱其电延安询毛泽东等有无新意见。”由此可见,中共方面关于此次谈判的方案,基本上以中共将领林彪在重庆的谈判为基础。早在1942年12月24日,林彪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四点意见:(1)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等地办党;(2)八路军、新四军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3)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4)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4](第417,510页)。

从5月4日至11日,双方举行了5次会谈,每次半日。会谈内容主要是围绕中共代表提出的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地方政府、承认中共领导的军队、中共军队改编的数额、恢复新四军番号、撤销对各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等问题。5月10日,林伯渠在给延安的电报中称:“张、王的态度是倾向照林彪提案解决,但不愿作正面肯定的表示。他们办法是探求我们能接受的意见向蒋报告,再由国民党中央作一提示案,交我转延安接受。”由此可见,在中共代表看来,王世杰等国民政府代表希望在林彪方案基

础上进行谈判。经过反复谈判,双方于11日达成了初步意见^[5](第258-259页)。

5月17日,王世杰携林伯渠同机离开西安,飞抵重庆,继续谈判。第二天,王世杰面见了蒋介石。据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前谒蒋先生,报告与林祖涵谈话情形,并郑重主张此次务成立若干初步解决办法,若干时以后,或可促毛泽东作进一步解决之商谈。蒋先生似亦以予之意见为然。”

5月31日,王世杰和张治中向蒋介石力陈应尽快解决中共问题,并提出了政治解决的初步方案。数日后,蒋同意了王、张提出的“中央政府提示案”,共3项18条。其主要内容为:中共军队编为4个军,10个师;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抗战结束后,召开国大,实施宪政,中共与其他政党享受同等待遇。

7月3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向王世杰、张治中口头转达了中共对于6月5日国民党提示案的意见,共四点内容:(一)民主尺度放宽;(二)中共军队编为16个师;(三)希望王世杰和张治中赴延安细商;(四)恢复中共在渝电台。7月13日晚,林伯渠与王世杰、张治中再度会谈。林提出希望王世杰和张治中至少有一人前往延安会谈,或答复中共所提的12条意见^[3](第209页)。

二、王世杰在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中起重要作用

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国共谈判的核心内容逐步转到了如何组建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上,标志着国共谈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民主政治要求的提出,标志着国共谈判的内容和性质已经出现了重大而深刻地变化。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主要是王世杰和张治中;共产党的主要代表仍是林伯渠。1944年8月4日,王世杰约见林伯渠、董必武,面告两件事:“(一)予与文伯将给彼等所提十二条意见以书面答复,彼应促中共对中央六月五日提示案迅提切实答案;(二)如彼等有答案送来而其内容不太坏,予将提请中央派文伯或予本人偕林赴延安一商。”^[3](第213页)从王世杰的日记可以看出,王或张前往延安谈判是经过蒋介石同意的。8月10日,王世杰针对中共所提的12条复函林伯渠,承诺“在抗战结束后一年以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3](第274页)。由此可见,此时的王世杰已看出中共的谈判重点已经转到了民主政治方面。他还向蒋介石建议:中共“如欲参加政府。政府可在行政院予以地位”^[6](第27页)。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关于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林伯渠在提出组建联合政府的同时,提出召开党派会议的问题。次年2月,“王世杰将党派会议更名为‘政治咨询会议’,理由是便于无党派人士参加,这个会议的任务是:‘统一军事及容纳国民党以外之人于政府’,因此,政治咨询会议是与参加政府相联系的。”^[6](第260页)

为了调停国共关系,美国政府先后任命魏德迈和赫尔利接替对国共两党有较明智认识的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这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赫尔利上任后,频繁在国共两党间调停,并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身份于11月7日飞赴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会谈。经过多次会谈,他和毛泽东达成了初步协定。赫尔利把协定带到重庆转给王世杰后,王世杰奉命将国民党的协议意见转给中共代表。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是要中共先交出军队,然后国民党再给中共以合法地位。11月22日上午,王世杰、宋子文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在赫尔利的寓所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进一步举行会谈。会谈主要在王世杰与周恩来之间进行。会谈内容集中在党派合法、中共在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的地位作用、中共军队的指挥权、蒋介石和毛泽东会面等问题。此后,国共双方的谈判继续进行。王世杰始终是国民党谈判代表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无论是提交协定草案还是斟酌条文内容,王世杰在国民党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也把王世杰作为主要谈判对手。1945年2月3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起草了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于当天交给了王世杰。内容如下: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解决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5](第583页)。

与此同时,王世杰也把国民党方面的有关方案递交给了周恩来。方案内容如下:(1)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2)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3)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3](第302页)。

303 页)。

对于周恩来与王世杰提出的方案,有学者经过比较认为:“周、王两案的主要区别在于,周案为单向的,即只提对国民党的政治要求;而王案则是双向的,既有国民党自身的结束训政问题,也有对中共的统一军事的要求。”^[6](第 81 页)

第二天,毛泽东即致电周恩来要其转告王世杰等人,表明共产党对谈判的态度,要求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取缔特务、自由、放人、撤兵四条。随后,王世杰与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两党举行了多轮谈判。2月14日,王世杰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表明国民党的谈判立场和观点。2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国共谈判宣告中断。周恩来回到延安后,当获悉国民党准备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时,于3月7日通过给王世杰写信的形式,表明了中共对此问题的看法和态度^[7](第 583 页)。

5月17日,王世杰和张治中邀请中共代表林伯渠、王若飞到重庆继续商谈。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经过多次接触和谈判,各自形成了两套谈判方案。国民党的第一方案为成立战时内阁,第二方案为提前行宪;共产党的第一方案为组建联合政府,第二方案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三、王世杰在重庆谈判中的首席地位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接连发出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8月28日,毛泽东乘飞机来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当天晚上,王世杰出席了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等人举行的欢迎宴会。随后,王世杰到毛泽东下榻的寓所做礼节性的拜会,并当面转交时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胡适的电报。在这份电文里,胡适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党,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显然不切实际。但他把如此重要的电文通过王世杰转交给毛泽东,反映出他和王世杰之间有着彼此信任的密切关系。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达成协议一共历时43天。参加谈判的国民政府代表四人,分别是王世杰(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四川省主席)、张治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若飞(中共中央秘书长)。谈判大致分为三个阶段:8月29日至9月3日是一般性交换意见阶段;9月4日至22日是就实质问题进行商谈的阶段;9月27日至10月10日是最后达成协议阶段。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双方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直接交换意见;一个是双方代表之间进行磋商。王世杰参加了第一阶段的谈判。9月2日和3日上午,毛泽东连续约见王世杰。据王世杰回忆,毛泽东9月2日与他会谈的地点在重庆桂园。这是一次比较系统的谈话,谈话内容将重庆谈判中将要涉及的问题都提了出来。毛泽东和王世杰分别代表共产党和国民党表达了各自的原则立场。毛泽东和王世杰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同王世杰继续商谈。

9月3日上午,毛泽东与王世杰继续会谈。9月4日上午,王世杰等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向蒋介石汇报谈判情况。当天下午,王世杰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前往伦敦,参加中、苏、英、法、美五国外交部长会议。王世杰不在重庆继续谈判,似乎表现出他对谈判的成功比较有信心。10月8日,王世杰回到重庆,当晚向蒋中正报告会议概况。这一天恰逢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举行会谈,商定即将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日子。

10月10日,王世杰代表国民党到重庆桂园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上签字。签字的国民党代表还有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中共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等。《会谈纪要》共12项内容,开篇讲到: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八月二十八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

由此可见,在1945年8—10月的国共谈判中,王世杰在国民政府四名代表中居于首席代表的地位。

在《会谈纪要》签署的当天晚上,王世杰再次与毛泽东长谈,希望毛泽东返回延安后再来重庆商议参

加政治协商会议事宜。这次谈判有些问题虽然未达成协议,但《会谈纪要》公布了双方的主张与分歧,有助于全国人民了解各方的立场和观点。《会谈纪要》签订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会谈并发表会谈纪要的形式,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国共双方都可以从相关表述中获得己方认同和需要的内容。

四、王世杰在国共停战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

《会谈纪要》签订后,以王世杰为首的国民政府代表和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为主要成员的中共代表继续就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国民大会等问题继续谈判。仅在10月20—23日就连续举行了四次会谈。

12月1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苏、美、英一致表示支持中国的“统一与民主”,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内部冲突。同一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到重庆,准备重开谈判。在此背景下,国共于12月27日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国民政府方面的谈判代表是王世杰、张群、邵力子;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王世杰等国民党代表与周恩来、王若飞就停止进兵、恢复交通问题进行会谈。王世杰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提出三点商谈内容:(1)铁路交通必须恢复;(2)中共军队撤退铁路线以外,其已占领之区域维持现状;(3)中共军事代表叶剑英应早来渝进行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8](第454页)。周恩来则代表中共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点提议。对于中共的提议,王世杰等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将认真考虑,并与美国特使马歇尔商讨后给予答复。12月27日,国共双方恢复谈判。国民党方面代表是王世杰、张群、邵力子;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中共代表提出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三项提议,并建议政协开幕日期可以定在1946年元旦。12月31日,王世杰与周恩来继续举行会谈,并递交了国民政府对中共12月27日提议的复文。复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

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受降有关事项,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

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推定公证人士5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亦请其推定公正人士参加。

早在重庆谈判结束后,王世杰就向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希望当年11月初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王世杰和周恩来等还初步商议了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盟、无党派等方面的代表名额和名单。

1946年1月10日,有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38人。王世杰是国民党方面8名代表之一。由于国共双方都不同程度做了让步,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通过了5项决议案后圆满闭幕。这次会议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生活中万众瞩目的一件大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中,王世杰在国民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共代表团有重大问题与国民党方面交涉,经常把王世杰摆在首位。1946年4月5日,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秦邦宪等为北平市当局搜查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滕代远公馆、解放报社、新华通讯社,逮捕44名人员之事,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抗议信送达的第一人就是王世杰,另外3人分别是邵力子、张群、张厉生。

4月21日,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为促请国民党解决各项问题致函国民党三代表,王世杰首当其冲,另外两人分别是邵力子、张厉生。

6月21日,中共代表团致函王世杰等人,商议东北停战、恢复全国交通、全国整军及复员、重开政治

协商会议等事情。

这一时期,王世杰接到中共代表团的信函还有反对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之事,为李公朴、闻一多遇害之事,反对国民政府在张家口及其周围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等内容。这一时期的谈判,从西安到重庆,尽管双方提案内容与立场相距甚远,进展不大,但彼此对对方立场的了解与日俱增。

随着国共关系的破裂,国民党于 1947 年 2 月通知中共驻南京等地的代表全部撤返延安,关闭了国共谈判的大门,第二次国共合作终告结束。

纵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程可以看出,王世杰始终是国民党谈判代表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无论是提交协定草案还是斟酌条文内容,王世杰在国民党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个人经历而言,王世杰曾有留学英法的学历,先后获得经济学和法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和法律系主任、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等职。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曾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杭立武称王世杰为蔡元培以后“学人从政之第一人”。从政治理念方面而言,“参加过 1911 年辛亥革命的王世杰,虽然与国民党有很深的渊源,但政治理念方面偏向胡适的自由主义。”^[9](第 120 页)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多次提出政治解决的方案,寻求缓和国共冲突的办法。作为蒋介石特别倚重的智囊和高级幕僚,在处理第二次国共关系问题上,他经常为蒋介石建言献策。在国共谈判的核心内容逐步转到了如何组建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上时,王世杰向蒋介石建议:中共“如欲参加政府。政府可在行政院予以地位”。在举世瞩目的 1945 年 8—10 月间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中,无论在早期的一般性交换意见阶段,还是最后达成协议阶段,王世杰都担任着重要的角色。最后签订《会谈纪要》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会谈并发表会谈纪要的形式,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国共双方都可以从相关表述中获得己方认同和需要的内容。王世杰作为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自然功不可没。

中共中央曾以党内文件的形式于 1946 年 2 月 7 日发出指示:“我们现在应谨慎地与蒋介石、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进行民主化工作,而反对西西复兴两系中的坚决反民主分子。”^[10](第 72-73 页)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于王世杰是区别对待,另眼相看的。在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中,中共代表团有重大问题与国民党方面交涉,经常把王世杰摆在首位。不仅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涉时往往以王世杰为主要对象,其他民主党派也常常把王世杰视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向其提出意见和建议。王世杰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地位及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参 考 文 献]

- [1] 《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2] 黄修荣:《国共关系史》中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 110 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4] 逢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 [5]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5 年版。
- [6]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 [7] 金冲及:《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 [8] 卓兆恒等:《停战谈判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9] 黄申如等:《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第 1 卷,台北:中央研究院 2008 年版。
- [1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责任编辑 桂 莉)